

11

性別與跨國遷移

藍佩嘉

現象發想	226
一、前言	227
二、理論與概念：如何研究性別與遷移？	228
◆早期：看見女人，加進去攪一攪	228
◆近期做法：分析性別，作為結構與關係	229
三、議題深探：遷移的型態與效果	230
◆遷移的型態本身就是性別化的	230
◆遷移的效果對於性別關係的影響	234
◆移民管制與國族建構的性別意涵	240
四、結語：性別化的流動、流動的性別	244
延伸閱讀	246
參考文獻	246

現象發想

「如果留在菲律賓，你只是一位母親、一個普通家庭主婦。這樣的事情不可能發生—每個星期天跟朋友說說笑笑、去跳 disco、去吃麥當勞，然後還有自己的手機！你在菲律賓可以想像這樣的生活嗎？我們戴首飾、穿迷你裙，我的家鄉很保守，如果我這樣穿，人家會瞪著我看。這是為什麼我們要來台灣啊，除了薪水，還有這樣的報償。」¹

* * *

我的寶寶才九個月
留在家鄉與我離別
我的內心如千針在刺
我來照顧別人的孩子
自己骨肉的冷暖卻全然不知
青天在上，大海激盪
祈禱家鄉的孩子
一切平平安安²

* * *

請不要叫我「大陸新娘」

沒有永遠的「新娘」，當我年滿四十領到台灣身分證，變成台灣歐巴桑的時候，我是不是還要在我的自尊與台灣人異樣的眼光中掙扎，漸漸老去呢？³

¹ 語出一位菲律賓移工 Claudia，改寫自 Lan（2006: 129）。

² 越南移工 Pham Thi Kim Ninh 的詩，〈我的寶寶才九個月〉，陳玉蓮、可白中譯，〈台北，請再聽我說〉。

³ 蕭冬梅，《不要叫我外籍新娘》，頁 54。

一、前言

你是否留意到，不知不覺中，台灣已經變成了一個「地球村」？在街頭等垃圾車或去醫院看病的時候，會遇到不少來自菲律賓或印尼的幫傭或看護工；台灣的各大小夜市現在都有越南小吃攤，掌廚的是遠渡重洋嫁來台灣的越南女性；街角林立的英語補習班裡，來自英美紐澳的白人老師，教台灣小孩說英文。我們身邊也有愈來愈多人因為留學、旅遊、工作等不同目的移出台灣，包括我們自己，都會在某些時候、以某種方式成為全球遷移人潮中的一員。

隨著交通與科技的進步，地理距離變得相對縮短，國家的疆界也變得更容易穿透。根據聯合國的估計，全世界目前有一億七千五百萬人居住在非出生地的國家，包括入籍或長期居留的移民、因工作或教育的短期遷移、循非法管道的遷移與人口販運、受庇護的難民等。而這些人之中有將近一半為女性（Oishi, 2005）。這樣的現象與二十世紀初以男性為主要遷移主體的現象大不相同，全球經濟的種種變化，已帶動了所謂「遷移的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的趨勢。

這樣的趨勢在亞洲也甚為明顯。學者估計目前在這個區域內有至少一百三十萬的女性移工，這個數目尚不包括以非法身分工作的人數（Yamanaka & Piper, 2003）。以台灣來說，根據勞委會 2006 年初的統計，外籍勞工在台人數其中有超過 60% 為女性⁴。婚姻移民的人數更是高度集中於女性，台灣不僅有許多新人口遷入，同時也有許多人口遷出，包括以投資或是依親方式的永久移民，因為



圖 11-1：中壢火車站後面已經形成一個東南亞城，各種語言的招牌齊聚一堂。（藍佩嘉攝影）

⁴ 勞委會職訓局外籍勞工統概況統計，網址 <http://www.evta.gov.tw/stat/9504/8130.pdf>，查詢日期：2006 年 5 月 29 日。

工作而造成的長期或短期的遷移，如台商與台籍幹部，以及因為留學、遊學而在國外短期居住者。近年來也出現所謂「回流」的現象，就是移民人口遷回台灣居住，有些個人與家庭甚至在太平洋或台灣海峽的兩岸，維持進進出出、雙邊居住的生活型態。

國際遷移正在改變當代世界與台灣的人口版圖，從性別的透鏡來考察遷移的原因、過程與結果是刻不容緩的研究課題。當我們把遷移看成一個「性別化的流動」過程時，我們也同時在研究「流動的性別」——性別關係與認同如何在人們跨越地理國界以及其他社會界線的過程中有所轉型與變化。

二、理論與概念：如何研究性別與遷移？

◆ 一 早期：看見女人，加進去攪一攪

很多台語流行歌曲描繪的是台灣經歷工業化過程中的城鄉遷移現象，其中的主角形象，多是「漂撇的男子漢」，而女人就是站在月台泣別、留守家鄉痴心等待的角色。早期的移民研究也是把遷移的主體假定為男性，僅視女性為跟隨父親或先生遷移的附屬品，到了七〇年代末至八〇年代初，才開始出現一些具有性別意識的學者，她們批評貌似性別中立的遷移理論其實隱藏著性別歧視。比方說，當時的統計資料與問卷調查都忽略女性遷移者的存在與經驗，直接針對男性進行調查，依此進行遷移總人口的推估，或要求男性受訪者代為描述太太與女性親戚的遷移經驗，就算是收集到了女性遷移者的資料。

有關遷移為何發生的傳統解釋為新古典經濟學的推拉理論，這個理論把個人的遷移訴諸於母國貧窮的「推力」，以及外國高薪的「拉力」。但這樣的說法已經受到許多修正與批評，新遷移經濟學（the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就指出遷移動機不是單純的個人決定，可能是家庭為了降低風險的集體決策。而性別學者進一步批評新遷移經濟學把家庭假定為利益均分的整體，忽略了家庭內部沿著性別軸線的權力衝突。比方說，有愈來愈多的女性是自主地決定要出國工作，有些甚至

是在先生或父親的反對下，堅持成行。雖然這些學者指出了遷移文獻的性別盲，建立了研究性別與遷移的正當性與必要性，但她們的研究取向也被後進批評為只是「加進女人來翻攪」。如洪達哥紐索多羅（Pierrette Hondagneu-Sotelo, 2003）指出三個主要的問題：第一、許多有關遷移的量化研究只是把性別當作一個變項，例如透過有關移民的教育程度與勞動參與的測量，來比較男性與女性的不同遷移模式。第二，許多研究轉而只研究女性遷移者，這種「限女性」（women only）的研究方式只把女人看成性別化的主體（也就是說，男人的經驗就與性別無關），如此一來，反而邊緣化了女性遷移者的經驗。第三，早期研究經常採用當時流行的性別角色理論，把性別化約為意識形態或文化的影響，至於其他的社會制度，如勞動市場、公私領域的區分則被當作是性別中立的。換言之，並沒有把性別當作一個全面的社會結構來分析。

近期做法：分析性別，作為結構與關係

早期的研究若叫做「女人與遷移」（Women and Migration）的研究取向，八〇年代後期形成的研究取向則可以稱之為「性別與遷移」（Gender and Migration）（Hondagneu-Sotelo, 2003）。這樣的路數變化跟性別研究近年來的理論轉向有密切的關係。其一，近期的女性主義理論強調要從關係而不是人口範疇，來思考性別。也就是說，我們經常把女人、男人當作既定、互斥的兩個範疇，就像廁所分男女一樣，但長髮男生在進入男廁時可能引起誤會，也有變裝的生理男性會使用女廁。所以我們應把性別看成是女性／男性作為一組相對、流動的社會建構。更具體來說，我們研究性別，不僅要研究女人，也要研究男人，並且要研究男女之間的社會關係與互動。其二，過去的女性主義理論把女人當作一個同質的群體，面對的是類似的父權壓迫，存在理所當然的女性情誼。這樣的說法已經受到當代女性主義者的質疑，因為女人之間其實充滿差異、矛盾與對立。因此，我們在研究性別時，必須同時研究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種族歧視、異性戀霸權等其他權力關係的交錯與締連。具體來說，當我們研究移民女性時，除了性別，我們同時也要看到她的階級位

置、族群與國籍、性取向等。

總結來說，性別不只是名詞，而是動詞，我們要研究的是遷移作為一個「性別化」的過程與結果⁵。相關的研究面向可以歸納為二：一是考察性別對遷移的作用，也就是遷移的型態有著怎樣的性別差異、遷移如何作為一個性別化的社會過程；二是考察遷移對於性別的影響，也就是遷移發生後對於性別關係與不平等造成怎樣的變與不變。以下將以勞動移民與婚姻移民的研究為例，針對與台灣社會脈絡較相關的課題，進行討論與說明。

三、議題深探：遷移的型態與效果

一 遷移的型態本身就是性別化的

- 性別如何關聯到遷移的動機、決定與驅力？
- 勞動力市場吸納男性與女性移民的方式有何不同？

1. 婚姻移民

如果說國際遷移促成了地球村的形成，那麼這個村子顯然不是一個平等、均質的權力空間。有些人擁有較多的管道與能力得以流動，突破時間與空間的侷限，但有人雖然移動卻在過程中無法主控，也有些人只能被動接受別人的移動，甚至被別人的移動所箝制⁶。用類似的角度來思考婚姻移民：什麼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力量，不論是全球或是在地層次，形塑了這些權力空間的不平等配置？為什麼通常是女性因為婚姻而遷移，而非男性？這意味著男性在跨國聯姻的過程中擁有較多的主控權嗎？女人在這個過程中只是被動接受嗎？她們在哪些面向擁有何種

⁵ 隨著理論工具的精進，近期的研究議題已出現進一步的擴充與深化。請參考 Pedraza (1991)、Pessar (2003)、Hondagneu-Sotelo (2003) 的文獻回顧與綜合整理。

⁶ 本段討論參考地理學家 Doreen Massey (1994) 提出「權力幾何學」(power geometry) 的概念，以及 Nicole Constable (2005) 延伸這個概念來討論婚姻移民中所涉及的性別化的權力地理學 (gendered geography of power)。

程度的能動性？

已有不少本土研究探討性別化的通婚動機，以及衍生跨國婚姻的結構原因與機制。夏曉鵬（2002）採取政治經濟學的鉅觀分析，指出台灣農村在工業化、都市化與國際化的過程中經歷的衰退與凋零，與「外籍新娘」現象有著結構上的密切關係。她強調這些跨洋娶親的男性，多是被經濟全球化排擠到邊緣的農、漁村子弟，由於在本地的戀愛與婚姻市場上缺乏競爭力，與外籍女性媒合不僅解決其婚姻的困境，也為農村家庭提供無酬勞動力。商品化的跨國聯姻除了提供農工男性面對邊緣化的經濟困境時的一種出路，也有許多台灣新郎是基於父母「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孝道壓力而跨洋尋婚（蕭昭娟，1999）。

駱明慶（2006）則從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另一種類型的婚姻移民——台灣女性與外國男性的通婚。他發現「外籍新郎」與「外籍新娘」在許多方面都有明顯的差異：地理空間的分布上，女性外籍配偶多分布於鄉鎮地區，但男性外籍配偶高度集中於都會地區，且多是來自西方國家的「洋女婿」；再者，國際聯姻的台灣男性，教育程度低於台灣男性的平均值，但與外國男性通婚的台灣女性的教育程度則明顯高於台灣女性的平均值。若從男女教育成就差異與性別文化的因素來解釋跨國通婚的台灣男、女在通婚對象與模式上的差異：隨著台灣女性受高等教育比例的增加，男性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的比例則多於女性，但傳統的婚配鼓吹的是「上嫁下娶」、「男高女低」的模式，以致高學歷的台灣女性、低學歷的台灣男性都有找不到對象的困難，於是分別往西方、南洋尋找跨國的婚配對象。

所謂「上嫁」的婚配模式，考量的不僅是教育程度的差距，在階層化的世界體系中跨國流動也是另一種「空間上嫁」（spatial hypergamy）（Constable, 2003）的模式，在有些例子裡甚至可以抵消夫妻雙方學歷上的差距。例如泰（Thai, 2005）的研究發現，許多低學歷、勞動階級的越南裔美國男性，回越南覓得的配偶是大學畢業的中產階級女性，不僅因為這些越南女性嚮往美國的生活，也因為她們在越南由於學歷過高難以覓得中意的婚配人選。相關研究也都強調，我們不應該把這些亞洲女

性全部視為被動的受害者，她們其實是主動積極地進行跨國交友與追求全球現代性，並且藉由跨國婚姻來逃脫母國的性別規範壓力或不理想的本地婚配對象。

2. 勞動移民

出國工作的人以男性或女性居多？為什麼？我們可以從國際分工的變遷來回答這個問題。八〇年代成長的國際遷移人口主要是男性，莎森（Saskia Sassen, 1988）指出，這是因為西方跨國資本進入第三世界國家建廠時，一方面破壞了農村維生經濟，另一方面偏好雇用薪資低廉的女性，導致男性失業、進而外移打工。然而，這樣的情形在八〇年代後期有了變化。以菲律賓來說，八〇年代，多是男人離家去中東或香港打工，後來因為許多重大營造工程完成、波斯灣戰爭爆發，男工紛紛失業返國，轉而變成菲律賓女人出國幫傭。

第一世界的全球城市在工業資本外移後，轉變為金融、服務主導的產業結構，在其中就業與居住的中產階級有大量外包家務與照顧工作的需要，進而促成了第三世界女性的跨國遷移（Sassen, 1988）。雇用移工的不只是歐美國家，中東、新加坡、香港、台灣、馬來西亞等半邊陲經濟體，也晉身為重要的勞力輸入國。外籍幫傭的雇用，既是亞洲的新富中產階級彰顯其階級流動的象徵性消費（Chin, 1998），也反映政府把照顧當作女性與家庭的責任，是一種把福利私人化的政策（林津如，2000）。

弔詭的現實是，把家務工作視為女人天職的父權邏輯，一方面限制了女性參與當地勞動市場的機會，另一方面卻保留了女人在全球勞力市場下的席位（niche）。社會學者哈許柴德（Hochschild, 2000）用「全球保母鏈」的概念來描述地球村中的國際不平等，已然轉換為日常生活中家庭生活照顧品質的不均等。再生產勞動階層分工的狀態也存在於台灣社會內部，如王宏仁（2001）所指出，因結婚遷移來台的東南亞裔女性，付出她們無酬的家務勞動來照顧台灣公婆與小孩，就算出外工作也多集中於幫傭、保母等非正式部門的再生產勞動。換言之，有錢家庭請

全球保母鏈

全球保母鏈 (global nanny chain) 的概念描述的是「再生產勞動的國際分工」(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reproductive labor) (Parrenas, 2001) 所形成一個層層外包的跨國分工鏈。經濟強勢國家中的富裕家庭，雇用弱勢國家的女人來家裡幫傭。這些外籍女傭不是母國最貧窮的女性，她們必須有若干經濟能力才付得

起仲介費，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教育程度或語言能力，才可取得出國的機會和管道。當這些女人出國工作時，很多會聘用來自鄉下、教育程度較低、更為貧窮的女人來照顧自己的小孩，這些本地女傭則把自己的孩子留給鄉下的媽媽照顧。

外籍幫傭，沒錢家庭娶外籍新娘，這樣的平行現象展現了婚姻「市場」與家務勞動力市場之間的結構關聯⁷。

這些女人為什麼決定出國工作？原因很多（藍佩嘉，2002），這裡只討論與性別相關的因素。一方面，許多女人出國工作的動機是爲了實踐她們的女性角色，如母親與女兒。很多女性移工是單親母親，有些在法律上還處於已婚狀態，但是先生並沒有負起照顧家計的責任。由於離婚在菲律賓是不合法的，合法分居只有在肢體暴力、亂倫、通姦等前提下才被允許，而申請程序又曠日費錢，因此，多數人訴諸非正式分居或甚至不告而別，在這種狀況下，許多單親母親爲了小孩的照顧與教育的財務負擔，選擇出國工作來賺取較高的工資。此外，也有相當數目的女性移工是單身，她們爲了盡到家庭中孝順女兒的責任，必須將一定比例的所得寄回奉養父母，或是支持其他的親戚，特別是贊助弟妹的教育費用。

另一方面，很多女人出國工作是爲了逃離女性角色所帶來的壓迫與

⁷ 我的研究中也發現，有些在台灣擔任監護工的東南亞女性，得到男性雇主的求婚，爲了不受契約限制繼續照顧他的生病的父母，這是從有酬家務勞工移動到無酬照顧工作者的移動路徑，詳細討論見 Lan (2003)。

侷限，有些已婚女性移工就是藉出國來逃離丈夫的家庭暴力、外遇或不快樂的婚姻關係。而除了突破既有婚姻框架之外，包括追求經濟獨立、開展社會網絡、探索同性情慾關係等也都是出國工作會帶來的可能性。此外，單身女性也把出國工作視為一個擺脫父母管控、探索未知世界的機會。來台灣的印尼移工，多是二十出頭的未婚女性，許多懷抱著一種「我要在結婚之前出去看看世界」的心情，有些更以出國就業作為緩衝，來抵擋父母的壓力、延緩過早進入婚姻。對這些女性來說，出國工作在某個程度上也許可以滿足她們脫離母國生活與父權家庭的想望；然而弔詭的是，當她們掙脫性別與婚姻枷鎖，往往是進入另一個階級支配的家庭空間，承受可能更嚴苛的生活及工作上的規訓與控制。

◆ 遷移的效果對於性別關係的影響

- 遷移是否為女人帶來解放、增權培力（empowerment）？是否可以持續？
- 遷移對於家庭型態、性別分工與夫妻、親子關係造成怎樣的影響？「家」的意義隨著成員的遷移與分離，有著怎樣的變化？

1. 女性移工與跨國家庭

對於女性移工來說，雖然出國工作充斥壓迫與剝削的可能，但是它同樣可能帶來解放與培力的空間。一名在菲律賓是全職家庭主婦的 Anamaria 笑著描述她在台灣幫傭的工作：「在這裡工作和我在菲律賓家裡的工作沒什麼不同，但我在這裡可以領到薪水！」當這些女性從無酬的家庭主婦變成了擁有經濟收入的「家務移工」，也成為家中主要的收入提供者，這樣分工位置的改變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夫妻間的權力關係。許多移工便戲稱她們的丈夫變成了「家庭主夫」（「houseband」或「huswife」），並在閒談中流露對於先生們在家事、管帳等事務上無能處理的批評。

然而，結構分工的位置逆轉並不保證移工的先生就會確實擔起家

務。這些丈夫在母國社會中面臨無能養家的污名，爲了維持男性雄風，有些人刻意離鄉工作，以逃避「女性化」的家務負擔 (Parrenas, 2005)，有些喝酒、賭博，把妻子賺來的錢闊綽地花用享樂。此外，婚姻關係的權力移轉在女性移工回國之後不見得能持續。移工出國存下來的錢通常用來投資簡單的傳統生意，例如 Jeepneys (菲律賓的吉普公車)、三輪車，及街坊的小型雜貨店。



圖 11-2：印尼幫傭星期天在新公園野餐，雇主的家是她們的職場，只好把公共空間變成溫馨小站。(藍佩嘉攝影)

女性移工購買的車輛，通常是由先生來駕駛，如果是單身女性，就握在爸爸或哥哥的手中 (Pertierra, 1992)。換句話說，把薪資與儲蓄轉換成生產工具的過程中，女性移工並不能夠充分擁有這些資產的控制權。

漂洋過海分隔兩地的情形，無疑對移工的婚姻關係形成挑戰。菲律賓媒體以「沙烏地症候群」的說法來描述在中東工作的菲律賓男性移工，擔心家鄉的太太會有外遇。丈夫的缺席不僅危及他對太太的性與身體的控制，也影響子嗣的生育；基此，許多男性移工在度假返鄉時就努力繁殖，透過讓太太懷孕，來避免別的男人精子不法佔據太太的子宮 (Margold, 1995)。女性移工也有類似的擔心，留在家鄉的先生發生外遇的情形更爲普遍，許多丈夫以妻子變得太過強勢、男性雄風受到威脅的理由（「你賺太多錢了，我覺得自己不像個真正的男人」、「你都沒陪在我身邊，我忍不住」），來合理化外遇的發生。

除了婚姻的潛在危機，出國工作對於移工母親來說，最昂貴的成本就是必須忍受與子女分離的思鄉之苦。然而，這些移工媽媽仍然努力跨越空間的距離進行「跨國母職」(transnational motherhood)。洪達哥紐索多羅和阿維拉 (Hondagneu-Sotelo & Avila, 1997) 提出這個概念來描述與子女分離的女性移民，透過擴充母職的定義，把養家活口視爲一種母

愛的實踐（「我出國工作是為了小孩」、「我離開他們是為了給他們一個更好的未來」），來讓自己與別人相信，她們並沒有變成一個不盡職的母親。不同於男性移工，只要定期匯錢回家就確保完成他們的跨國父職，由於母親被視為主要的家庭照顧者，女性移工雖然無法陪著小孩，仍須透過電話、信件、手機簡訊、禮物等方式努力表現她們的愛與關心，以免遭到遺棄小孩的道德譴責。

2. 商業移民與男性雄風

資本的跨國移動，近年來也帶動許多因為個人投資或是公司外派到中國大陸以及東南亞的商業移民，也就是所謂的「台商」或「台籍幹部」，而這些人多以男性為主。其實不只是台灣，以男性為主的商業移民，在許多地區都扮演著為全球資本開疆闢土的先鋒隊，也鞏固了一種主流男性特質，柯諾（R. W. Connell, 1998）稱之為「跨國商業雄風」（transnational business masculinity）。沈秀華（Shen, 2005）訪問的一名台商，便以基因的生物因素來強調，女人天生不合適冒險犯難，男人比較適合遷移到異地、開拓新天地的生涯。

當然，男性移民的瀟灑路徑，背後多有一雙看不見的女人手，提供身心的支持以及穩定家庭的秩序。沈秀華（Shen, 2005）的研究指出，留守台灣的太太，既擔憂先生外遇的可能，也理性地面對難以避免的婚姻挑戰（如替先生打包行李時默默放進保險套，以防傳染性病）。台商的移居也帶動了當地性產業的發展以及衍生「包二奶」的婚外關係。去性化的台灣太太提供了情緒勞動，中國的卡拉 OK 小姐與女朋友提供了性服務，是這兩群女人的跨國分工，促成了「跨國商業雄風」的豪邁。

王君琳（2002）的研究試圖呈現這些台灣太太的主體性。有些女人決定跟著台商或台幹丈夫遷移，她們在新環境中努力重構「家」的意義。有更多的女性決定不遷移，在「分偶家庭」的狀況下，她們的家庭生活與社會網絡也可能產生正面的轉變。王君琳發現，在先生離家後，由於家務勞動的減輕，以及父權控制力量的減弱（先生不在家、婆婆管不到），這些女性反而能享有更自主、豐富的生活空間，她們也藉由與

鄰居朋友的網絡建立更流動而多元的家庭生活，挑戰了主流社會以婚姻關係來界定「家」的概念。

問題討論 11-1：

不少台灣中上階級家庭把小孩送去國外當小留學生，美國社會稱為「降落傘小孩」(parachute children)，並把太平洋兩岸飛來飛去在母國工作、在異鄉陪讀的父母稱為「太空人父母」(astronaut parents)，這些父母要如何在無法伴隨小孩的狀況下來遂行親職？這樣的跨國親職與家庭，和上述移工的經驗有怎樣的同與不同？

3. 當男人跟隨女人遷移

對男性台商來說，遷移的行動是養家角色、男性雄風的展現，但有些男人是由擁有工作簽證的太太申請依親而移民，這樣的遷移模式對於夫妻關係與性別分工會造成怎樣的影響？喬治 (Sheba George, 2005) 所研究的遷移到美國的印度護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由於美國內陸城市與鄉村的護士缺工嚴重，在 1965 年的移民法令鬆綁後，亞洲國家如印度、菲律賓成為招募勞動力的重要來源⁸；這些印度護士都是隻身赴美工作，等到經濟基礎穩定、居留一定年限後，才用依親的方式把先生、小孩接來。這樣的一種由女性主導牽動的移民網絡，不僅背離於傳統的男性遷移、女性跟隨的模式，移居後的家庭關係與性別分工也和他們在印度的情形截然不同。這些非高學歷的印度男性在美國的勞動市場中很難找到高薪的工作，許多在移民社區裡打零工，或者留在家裡協助照顧家務，換言之，這些丈夫同時經歷了性別角色的逆轉與階級的向下流動。

除了指出勞動市場的地位高低對於家庭生活的性別權力的影響，喬治進一步觀察到，私領域的性別關係如何影響公領域的性別關係，這裡指的是以基督教會為中心的印度移民社區。儘管這些印度先生在家中

⁸ 事實上，當時也有不少台灣護士循此管道移民美國，近年來也有不少台灣護士被招募到英國等地工作。

中地位受損，也在美國社會中飽受種族歧視，他們在宗教社群中積極參與，包括主辦週日野餐會、領導唱詩班，這些在印度其實多是女人從事的工作。到了異鄉，他們訴諸尋求教會社群裡的領導位置，試圖以這樣的培力策略，來去除他們被譏為「護士的老公」(nurse husbands) 的污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譏諷通常來自於其他的印度男性移民，如高學歷的矽谷工程師。喬治的研究成功地示範了如何研究移民經驗中的性別、階級、種族等社會關係的交織，也提醒我們，工作、家庭、社區等不同領域中的性別關係，可以有相輔相成、衝突取消、平行存在等不同型態的交互影響。

問題討論 11-2：

有人觀察，台灣女生在出國留學的時候，相對於台灣男生，對於環境的適應較為良好，也比較容易交到外國朋友或是伴侶，為什麼？請和印度護士家庭的例子作比較，來討論性別與階級、種族之間的糾結關係。

4. 新天地或異鄉囚？

仲介媒合的跨國聯姻其實不只出現在台灣，歐洲、北美、日本等地也都有「郵購新娘」(mail-order brides) 的現象。弔詭的是，當白人男性前往亞洲，尋找尚未受到女性主義「洗腦」的「傳統女性」來扮演父權家庭的理想妻子角色，亞洲女性也朝向西方，尋找較為「浪漫體貼」的男性伴侶，來實現符合她們所想像的「現代」婚姻與伴侶關係 (Constable, 2003)。在台灣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傳統與現代間的拉扯，有些跨洋尋親的台灣新郎認為台灣女性太過挑剔、獨立，認為越南女性較為順從、單純。不少越南配偶也會說，越南的男人「大男人」、又「懶惰不做事」，台灣男人據說比較「體貼、顧家」。這樣的認知與想像上的落差，很容易造成雙方對於婚姻生活與配偶角色期待的衝突。

如同勞動遷移的研究，我們可以把「遷移是否讓女人增權培力」的這個命題，用來探討婚姻移民的後果。究竟，跨國婚姻帶領這些女性

移民走向的是一個現代性的新天地，或是異鄉的無形囚牢？對於來自貧窮國家鄉下地區的女性來說，跨國婚姻的確是一條潛在的向上流動的途徑，不論是透過「空間上嫁」來追求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或是希望逃離貧窮與失業，到工作機會較多的國家實現經濟獨立，以幫助母國的家庭。然而，期待中的向上流動，未必與現實中的婚姻生活相符。許多夫家位居農村與漁村，「外籍新娘」在婚後發現台灣並不如



圖 11-3：越南裔配偶參加台北市政府舉辦的國語演講比賽。（范明秋攝影）

想像中富裕，甚至面臨經濟拮据與社會孤立的困境。新移民女性的工作機會，也因為族群與公民身分的弱勢，受到很大的侷限。根據邱琚雯（2003）的調查，多集中於以夫家或親友網絡所延伸出去的工作，特別是家庭代工、在丈夫或親友的店攤幫忙。也因為這樣，她們的生活機會受到夫家相當的牽制，因為工作而帶來的培力，仍有一定的限制。

由於嫁來台灣的東南亞籍配偶普遍被期待要負擔家務，與公婆同住的情形也居多。相關研究指出，婚姻移民女性由於社會位置與婚姻地位的弱勢，可能面對較高的家庭暴力風險（潘淑滿，2004）或壓迫性的婆媳關係（蕭昭娟，1999）。沈倖如（2003）的研究則觀察到她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抵抗策略。相對於台灣媳婦受到孝道意識形態、娘家不插手（避免破壞兩家感情）、社會道德壓力等束縛，商品化婚姻中的「脫鑲嵌的社會關係」反而弔詭地提供了婚姻移民女性逃離社會控制的空間。比方說，有人透過偷吃避孕藥、偷偷墮胎的方式來延緩生小孩，或是要脅帶小孩離開台灣、搬回娘家，來替自己爭取夫家中的地位與權力。



圖 11-4：由非政府組織、移工 / 移民團體、學者聯合組成的「移民 / 移住人權修法聯盟」，於 2003 年 12 月正式成立。(婦女新知基金會提供)

但是個人式的反抗策略所帶來的培力效果畢竟有限，更積極的方式還是尋求社群的結盟，許多研究指出使用手機、出外工作上課與參與結社組織，都提供了新移民女性拓展人際網絡、克服社會孤立的重要力量。夏曉鵬與台灣南洋姊妹會所推動的「外籍配偶識字班」，強調以學中文為媒介，促使新移民女性形成自主發聲的組織，為自身爭取權益。透過這些課程，新移民女性除了提升中文聽說讀寫能力外，也產生自信心與尊榮感，並拓展人

際關係和生活圈，增進與家人的溝通（釋自淳、夏曉鵬，2003）。

◆ 移民管制與國族建構的性別意涵

- 移出女性如何成為母國國族建構的中介？移入女性如何成為地主國國族建構的中介？
- 國際遷移的現象對公民身分的概念造成怎樣的衝擊？如何促成兼顧平等與差異的多元文化社會？

你可能很納悶，既然我們討論的是「跨國」遷移，為什麼要強調國家的角色？其實，雖然跨越國界遷移的人口愈來愈多，不代表國家的管制與介入就消失或降低了。事實上，因為國家的移民政策對於人口的移出與移入都有關鍵性的影響，比方說，誰可以移動？往哪裡移動？誰可以變成公民？根據什麼原則？

移工與移民的身體雖然已經在遷移旅程中離開母國的疆界，但她 / 他們的流離身體，仍然受到國家的召喚、約束。國家的移民管制的主

要目的是什麼呢？包括原生國對於人口移出的限制，與地主國對於移入人口的管制，其實都在確立、建構國家有形與無形的疆界。女性主義文獻已經指出，女人的身體是國族建構的重要邊界標誌（boundary marker），標示出領土、文化、生物學等三層意義的族群邊界（伊藤，1995，引自邱淑雯，2003: 150）。余瑪戴維斯及安習雅斯（Yuval-Davis & Anthias, 1989）歸納出下面的五個方式：（1）女人擔任生育繁衍國族社群下一代的角色；（2）經由性與婚姻的管制，女人的子宮控制鞏固了國族團體的界線；（3）女人是將國族文化與價值傳遞給下一代的重要媒介；（4）女人的形象作為國族文化差異的象徵表意者（symbolic signifier）；（5）女人作為國族鬥爭的參與者。以下，我們將從這個理論架構來考察移民管制與國族建構的性別意涵。

1. 流離的國族身體

許多母國政府都積極促成勞動力的外移，一方面可以解決國內失業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可透過移工與移民的海外所得，為國家帶來可觀的外匯。所以，雖然這些國民已經離開了地理上的祖國，母國政府仍然要透過國族意識形態的建構來確保這些「海外僑胞」對母國的忠誠。例如，菲律賓政府把海外勞工頌揚為「國家英雄」（national hero），將其地位比擬為昔日流亡海外的革命英雄。而這樣的國家政策與論述中，往往存在性別的差異。

澳依喜（Nana Oishi, 2005）指出，亞洲地主國政府對於男性公民跨國遷移的管制較少，但對女性管制較多；對男性的移民管制主要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但對於女性的移民管制卻是高度道德價值取向的。國家把女性移工視為需要「保護」的對象，限制其年齡、工作行業與輸出國家⁹。這樣的國家法令在「保護」女性身體的同時，也透過限制女性公

⁹ 南亞國家的管制普遍較為嚴格，如孟加拉禁止女性出國從事家庭幫傭、娛樂員，只允許擔任護士、醫生與工程師。比較寬鬆的東南亞國家也有年齡限制，如印尼女性最少要 22 歲以上才能出國；菲律賓規定家務幫傭要 21 歲以上，娛樂員要 18 歲以上，護士要 23 歲以上。泰國則除了特定地主國之外，禁止女性出國工作。



圖 11-5：菲律賓移民在中山北路聖多福教堂前舉行的節慶遊行，替台北街頭添增多元文化的風味。(藍佩嘉攝影)。

民的遷移自由，來管束控制可繁衍的女人身體，更準確地說，透過對於移工的性與生育的控制，來捍衛家庭與國族的界線〔上述架構的第(2)點〕。

這樣的道德論述也經常內化為女性移工的自我認同與規訓。許多研究已經指出，女性移工視自己在海外流離的身體為國家領土的延伸，透過對於自己以及同鄉的道德規訓與性控制，來維護國族尊嚴。比方說，在台灣訪問的一些外籍女傭會指責其他國家的女性移工有男女關係混亂、婚外情慾關係，與異族男性交往等品行缺陷(Lan, 2006: 90-92)。這樣的道德

論述，除了用來彰顯「我國女性」在品行和價值上的優越性，凌駕於勞力市場上來自其他國家的競爭對手，也透過女人的「貞潔」身體來書寫國族的象徵界線、爭奪全球村裡的國族道德位階。

上述架構的第(4)點提到，女性的形象經常被用來象徵國族文化的差異，這是為什麼基本教義派的運動多對於女性的穿著、打扮有嚴格的規範。在這樣的思考框架下，女性的跨國遷移，相對於男性，被認為可能對於傳統的文化與價值造成更明顯的衝擊。結果，女性在移民社群裡經常面臨比在國內更強的壓力與監控，要證明自己沒有被外來文化所「污染」，她們必須透過身體規訓來體現民族文化的界線。移居美國工作的印度護士(George, 2005)也是如此。由於護士與男病人在工作上有肌膚接觸，在保守的印度家鄉被視為一個女性不宜的不潔工作。雖然這個工作使她們成為經濟獨立的遷移領航者，她們在移民社區與教會裡卻打扮格外謹慎。她們多穿著保守的印度沙龍，而非引人議論的褲裝；表現盡量符合傳統女性角色，以免被人貼上過度西化的「髒護士」(dirty nurse)的污名標籤。

2. 入侵的異族身體

生育子女是多數外籍與大陸配偶嫁來台灣以後的重要使命，此舉除了滿足公婆與丈夫對於傳宗接代的期待，也能幫助她們早日取得中華民國的公民身分。如趙彥寧（2004）所言，媳婦在父權家庭傳承子嗣的宿命，在此與種族化的族群政治相結合，要成為「正港的台灣人」，外籍與大陸新娘唯有透過成為「新台灣之子」的母親。生育也變成一種夫家對媳婦行使控制的方式，公婆與先生認為，外籍與大陸配偶懷孕以後就不會「趴趴走」，待在家照顧小孩，可以降低「跑掉」的風險。

然而，當外來的女人子宮負責生育繁衍國族社群下一代時（也就是上述架構的第一點），引起了穿透、模糊國族界線的焦慮。台灣官員、立委與民間擔心新移民子女有「混血」、「不良基因」等問題，把深皮膚的「外來人口」視為危險、落後、不衛生、不文明的次等族類，需要防範隔絕與改造治理。甚至有官員不諱言要求來自東南亞與中國大陸的移民母親應該節育以保國力，這些論述所投射出的自我意象，是把台灣想像為一個同質的文化社群、血統純淨的基因庫，進而藐視移民母國的文化價值，或者恐慌於外來種族的滲透¹⁰。

其次，有關外籍配偶子女「發育遲緩」、外籍母親「無力教養」等社會指責，反映出上述架構的第（3）點：女人被假定為傳遞國族文化、維繫社區家庭的礎石。類似的憂慮與指責很少出現在男性的外籍配偶的身上，主要是新移民母親被懷疑是否能成功擔任「新台灣之子」的主要照顧者、有效地傳遞國族文化與價值給「未來的主人翁」。

台灣社會對於外籍配偶的「照顧輔導」，多集中在她們是否可以被同化、有效教養「新台灣之子」，以「生活適應」或「文化適應」為題進行的有關婚姻移民女性的研究，經常隱含了一種以台灣社會與文化為中心的立場（「外籍配偶是否能成功的融入我們的社會？」）。其實根據研究，文化適應、經濟壓力以及與外界資源系統間的溝通障礙與衝突，

¹⁰ 有關外籍配偶的媒體建構，請參考夏曉鵬《流離尋岸》書中的第二章；有關藍領移工的污名化，請參考藍佩嘉的〈種族歧視修辭學〉一文，原刊登於《中國時報》觀念平台，2005年4月8日，可於網頁下載：<http://pclan.social.ntu.edu.tw/html/report-set.htm>。

才是造成南洋母親在教養子女時的主要困境（吳秀照，2004）。由於新移民母親無法充分操控台灣本地的語言，造成她們文化調適、轉譯上的阻礙，因而難以有效建立與學校、社區的連結，來協助孩子的成長與學習。再者，也因為新移民母親的語言與文化差異並不被台灣的教育環境所重視，只被看成負債而非資產，在這樣的觀點下，外籍配偶被視為族群、文化的她者，而來自中國大陸的配偶更被當作政治的她者。

公民身分的爭取是新移民組織權利運動的核心，尤其是大陸配偶更因為兩岸關係的緊繃而面臨特殊化的排除條款。許多研究指出，就算新移民取得了形式上的公民身分，但因種種限制，也無法充分行使「實質公民權」。例如，遭受家暴的外籍配偶，往往無法利用現有的求助系統，因為語言限制、資訊不足、相關工作人員的不友善態度等（夏曉鵬，2005）。新移民權利運動的目標，除了爭取經濟與政治資源的重分配，還要爭取文化上的認可與尊重，也就是所謂「文化公民身分」的概念。近年來，「多元文化」在企圖化解族群衝突的台灣社會中，已經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口號，然而，經常也淪為政客的口頭宣示與庸俗的文化展演。政府舉辦的大型宣導活動，經常是嘉年華式的文化大拜拜，例如讓新移民穿著異國服裝表演、烹煮南洋料理。實踐多元文化的主要教育對象應是台灣民眾，優勢族群應學習瞭解與尊重文化差異，特別是在國家機器的末梢，位居第一線與外籍配偶互動的人員，包括警察、公衛護士、醫護人員、老師等。近來也有不少民間組織開始推動以移民與移工為主體的文化運動，希望能藉由寫作、歌唱、攝影等文化實作（詳見延伸閱讀），讓新移民積極發聲、成為多元文化的行動主體。

四、結語：性別化的流動、流動的性別

拉開歷史的軸線，台灣的人口其實是由一波波越洋渡海的人群所構成，我們都是移民的後代，身體裡流著跨越族群界線通婚的血液與基因。我們的漢人祖先，被貧窮所逼渡海來台的羅漢腳，其命運不就像今日離鄉背井來台灣打工的東南亞勞工？他們為了成家，從中國原鄉找人

介紹老婆，不是近似於現今去越南找老婆的台灣農工男性？當年去日本打拼、或來台北工作的台灣父母，把小孩留給鄉下的阿公阿媽照顧，這情節豈不讓人想起如今因為環境限制、把「新台灣之子」交給越南娘家托養的越南配偶？

過去遷移者的形象，是剽悍的羅漢腳，如今的遷移人口，有愈來愈多的女性，有為子女打拼未來的堅毅母親，也有為自己開拓新天地的勇敢女兒。在本章中，我們看到，遷移既反映了性別的壓迫，卻也可能提供了逃逸父權的出路。對於這些女性來說，遷移的後果可能是強化了控制與剝削，但也同時帶來解放與培力的空間。女人的流動穿透了地理、文化、人口學的國族疆界，這或許讓國族主義者感到焦慮，卻也是促使人們反思多元文化的起點。面對變動中的世界與台灣，我們需要更深刻地瞭解性別化的國際遷移現象，透過研究的投入與政治的行動去改變既有的性別、族群、階級等權力關係所造成的壓迫與不平等。

問題討論 11-3：

分組討論在台灣的福利制度、教育體系、語言與文化環境裡，有哪些因素可能造成了新移民及其子女行使公民權利時的障礙？如何可能改善這些問題？如何可能落實兼顧平等與差異的「多元文化」社會？

延伸閱讀

【文獻】

- 龔允倩主編（2002）台北，請聽我說：外籍勞工詩文選集。台北市勞工局。
龔允倩主編（2002）台北，請再聽我說：外籍勞工詩文選集。台北市勞工局。
夏曉鵬主編（2005）不要叫我外籍新娘。台北：左岸。
「新移民、初體驗」專題，誠品好讀第 65 期，2006 年 5 月。台北：誠品。

【影片】

- 榴槤飄飄（2001）陳果導演，群體影業公司發行。
麵包與玫瑰（*Bread and Roses*）（2000）Ken Loach 導演，春暉公司發行。
美麗壞東西（*Dirty Pretty Things*）（2002）Stephen Frears 導演，奔騰國際公司發行。

【紀錄片】

- 台商台商（2003）廖錦桂導演，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發行。
離鄉背井去打工（*Shattered Dreams*）（2003）李道明導演，光啓社發行。
菲籍女傭的悲歌（*Chain of Love*）（2002），Marije Meerman 導演，First Run Icarus Films 發行。
我的強娜威（2003）蔡崇隆導演，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發行。
黑仔討老婆（2003）蔡崇隆導演，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發行。
中國新娘在台灣（2003）蔡崇隆導演，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發行。
外籍新娘在美濃（2003）林筱芳導演。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王君琳（2002）流動的家：大陸台商女性配偶的家生活與認同。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宏仁（2001）社會階層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41: 99-127。
沈偉如（2003）天堂之梯？：台越跨國商品化婚姻中的權力與抵抗。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秀照（2004）東南亞外籍女性配偶對於發展遲緩子女的教養環境與主體經驗初探：從生態系統觀點及相關研究分析。社區發展季刊 105: 159-175。

- 邱淑雯 (2003) 性別與移動：日本與台灣的亞洲新娘。台北：時英。
- 林津如 (2000) 「外傭政策」與女人之戰：女性主義策略再思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39: 93-151。
- 夏曉鵬 (2002) 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北：唐山。
- 夏曉鵬 (2005) 全球化下台灣的移民 / 移工問題。瞿海源、張苙雲 (編) 台灣的社會問題 2005 (頁 328-367)。台北：巨流。
- 趙彥寧 (2004) 現代性想像與國境管理的衝突：以中國婚姻移民女性為研究案例。台灣社會學刊 32: 59-102。
- 潘淑滿 (2004) 婚姻移民女性、婚姻暴力與公民權。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 8(1): 85-132。
- 駱明慶 (2006) 教育成就的性別差異與國際通婚。經濟論文叢刊 34(1): 79-115。
- 藍佩嘉 (2002) 跨越國界的生命地圖：菲籍家務移工的流動與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32: 169-218。
- 蕭昭娟 (1999) 國際遷移之調適研究：以彰化縣社頭鄉外籍新娘為例。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博士論文。
- 釋自淳、夏曉鵬 (2003) 識字與女性培力：以「外籍新娘識字班」為例。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3(2): 41-84。

英文文獻

- Chin, B. N. C. (1998). *Service and servitude: Foreign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and Malaysian "modernity pro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onnell, R. W. (1998). Masculinities and globalization. *Men and Masculinities*, 1, 3-23.
- Constable, N. (1997). *Maid to order in Hong Kong: Stories of Filipina worke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onstable, N. (2003). *Romance on a global stage: Pen pals, virtual ethnography, and "mail-order" marriag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nstable, N. (2005). Introduction: Cross-border marriages, gendered mobility and global hypergamy. In N. Constable (Ed.), *Crossing-border marriages: gender and mobility in transnational Asia* (pp. 1-16).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George, S. (2005). *When women come first: Gender and class i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chschild, A. (2000). The nanny chain, *The American Prospect* 11, 32-36.
- Hondagneu-Sotelo, P. & Avila, E. (1997). "I am here, but I am there": The meanings of Latina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Gender and Society*, 11(5), 548-571.
- Hondagneu-Sotelo, P. (2003). Gender and immigra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introduction. In P. Hondagneu-Sotelo (Ed.), *Gender and U.S. immigration: Contemporary trends*

- (pp. 20-4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an, P. (2003). Maid or madam? Filipina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continuity of domestic labor. *Gender & Society*, 17(2), 187-208.
- Lan, P. (2006). *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argold, J. (1995). Narratives of masculinity and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Filipino workers in the Middle East. In A. Ong & M. G. Pelez. (Eds.), *Bewitching women, pious men: Gender and body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pp. 274-19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ssey, D. (1994). *Space, place and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Oishi, N. (2005). *Women on the move: Globalization, state policies and labor migration in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rrenas, R. S. (2001). *Servants of globalization: Women, migration and domestic work*.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rrenas, R. S. (2005). *Children of global migratio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gendered wo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ssar, P. (2003). Engendering migration studies: The case of new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 Hondagneu-Sotelo (Ed.), *Gender and U.S. immigration: Contemporary trends* (pp. 20-4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edraza, S. (1991). Women and migration: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gende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303-325.
- Pertierra, R. (1992). *Remittances and returnees: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migration in Ilocos*. Quezon City: New Day.
- Sassen, S. (1988). *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labor flo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en, H. C. (2005). "The first Taiwanese wives" and "the Chinese mistresses":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in intimate and familiar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Global Networks*, 5(4), 419-437.
- Thai, H. C. (2005). Clashing dreams in the Vietnamese diaspora: Highly-educated overseas brides and low-wage U.S. husbands. In N. Constable (Ed.), *Crossing-border marriages: Gender and mobility in transnational Asia* (pp. 145-165).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Yamanaka, K. & Piper, N. (2003). An introductory overview.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Review*, 12(1-2), 1-19.
- Yuval-Davis, N. & Anthias, F. (1989). *Woma-state-nation*. London: Macmillan.